

# 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

阎学通

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未来崛起进程的认识。一个大国用30年时间崛起为世界强国和经过300年成为世界强国,这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人为的,后者是天定的;前者需要战略,后者需要运气。中国要制定崛起的战略,就需要不断地了解自己所处的实力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实力地位,笔者也曾参与其中。<sup>①</sup>至今十多年已经过去,而学者们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分歧依然如故。本文将从这些认识分歧入手,改变普遍使用的指数分析法,从实力等级常识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实力地位,希望能为判断中国的实力地位提供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从而为人们就中国实力地位的性质及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条件提供一个有可能达成共识的认识基础。

---

<sup>①</sup> 阎学通等:《当前我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4期,第21—22页。

---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第1—25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一、认识分歧及其原因

### (一) 多种评估分歧

苏联于1991年解体,次年就出现了有关中国实力地位的争论。1992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45%。<sup>①</sup>后来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标准统计的结果是,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按汇率计算的4.7倍。<sup>②</sup>这使中国的GDP达到了3.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的56%。笔者曾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1993年已达到世界第三。<sup>③</sup>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初,多数学者是以汇率标准判断中国实力的,认为中国实力还不如法国,远达不到世界第三的地位,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世界第六。<sup>④</sup>

到了21世纪初,人们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分歧依然存在。只是到此时,有关中国实力地位的分歧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实力地位的排序是第几,而且开始争论中国是否已经成为超级大国。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一位院士撰文说,中国“早就赢得了全世界的极高尊重,真正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新的超级大国”,而且认为中国的谦逊传统使中国学者自贬中国的实力。<sup>⑤</sup>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已于1998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尚未达到超级大国的水平。<sup>⑥</sup>有的学者则认为,1998年中国的综合国力仍位居世界第六,不仅小于日本的综合国力而且小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sup>⑦</sup>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崛起

① “China Survey,” *The Economist*, November 28, 1992, p. 5.

② The World Bank, *199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ions*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1997), p. 6.

③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④ 黄硕风:《大较量:国力球力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页。

⑤ 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国际意义》,《远东问题》(俄)2004年10月。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日,第16版。

⑥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兼论中国大战略(代译序)》,见阿什利·泰利斯等:《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门洪华、黄福武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战略大格局: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得很快,但还得努力十几年,到2016年才能赶上日本。<sup>①</sup>

### (二) 分歧的政治原因

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分歧可能源于多种原因。首先是政治原因促使人们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地位。政治原因可以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类,但两类原因都有可能导导致人们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地位。

高估中国实力地位的正面政治原因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国际组织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希望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例如,世界银行制定的购买力平价标准使2003年中国的GDP达到6.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0.9万亿美元的58.7%和日本3.6万亿美元的1.7倍。<sup>②</sup>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4年访问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富裕国家担负起一个重大责任,对此,中国也责无旁贷。我知道,你们习惯将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看待,中国也的确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许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不过,中国发展越成功,人们也就越期待中国能够对那些仍然需要援助之手的小国、穷国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同样,随着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地位不断提高,她在世界安全方面也应分担更大的责任。”<sup>③</sup>

有些人高估中国实力的目的是负面的,是想证明中国已经构成对现有国际秩序或其他国家的威胁。为促使政府对中国采取防范政策,这些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超过日本,将来有可能对美国的实力地位构成挑战。他们对中国国防开支的评估一般都比中国官方数字大几倍。<sup>④</sup> 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3年的国防开支达到了600亿美元。<sup>⑤</sup>

低估中国实力地位的正面政治动机是想消除“中国威胁论”或是担心中国

① 马库斯·吉:《中国在崛起:准备迎接中国世纪》,《环球邮报》(加拿大)2004年10月23日。转引自《环球时报》2005年1月5日,第9版。

② 《2003年世界银行统计资料》,见[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_PPP.pdf](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_PPP.pdf)。

③ 《安南秘书长在清华演讲全文》,见<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8809>。

④ Joseph Grieco, “China and American in the New World,” in Carolyn W. Pumphrey, ed.,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 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p. 25.

⑤ 马克·赫尔普林:《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亚洲华尔街日报》2004年12月1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5年1月6日,第16版。

政府搞军备竞赛会重复苏联解体的历史。许多中国人担心,承认中国的客观实力地位会促使世界霸主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防范对象。另外有些人认为,美国想用“台独”问题将中国拉入军备竞赛的圈套,而当年苏联解体就是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sup>①</sup> 为了防止中国政府陷入与美国军备竞赛的圈套,他们尽量低估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中国 21 世纪初的实力地位定位于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sup>②</sup> 他们认为,坚持中国现有实力很弱的观点,才能防止“中国威胁论”者“捧杀”中国。<sup>③</sup> 因负面政治原因低估中国实力的也是有的,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政府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一些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人,他们从内心不愿意承认中国实力地位上升的现实。

### (三) 分歧的技术原因

除政治原因之外,导致对中国实力地位认识分歧的另一个原因是衡量方法不一致。到目前为止,有关综合国力衡量的方法已有十几种,基本上都是采用指数衡量法。总体趋势是衡量方法日益复杂,但各种衡量方法没有共同标准,缺少继承性的发展。衡量方法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仅就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选择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例如,清华大学的学者将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定为 8 类 23 项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则设为 8 个方面 64 项指标;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学者分了 7 个方面 29 项二级指标,根据其设计原则,第三级指标应近百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则制定了 7 个方面的 115 项基础指标。<sup>④</sup> 由于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因此增加实力构成要素和提高衡量方法复杂程度的方法均未能增强实力衡量的准确性。

由于没有共同标准,各种方法得出的衡量结果差别很大。例如,军事科学

---

① 笔者认为,苏联解体源于戈尔巴乔夫未以武力阻止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所致,与军备竞赛无关。美国和朝鲜在冷战时期参与的军备竞赛不亚于苏联,但这两个国家都未解体,因此将苏联解体归于军备竞赛缺乏有效的科学论证。

② 冯昭奎:《重新认识大国的实力》,《世界知识》2002 年第 7 期,第 8 页。

③ 《正确估价中国实力》,《人民日报》2004 年 12 月 3 日,第 7 版。

④ 参见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第 4、12 页;王颂芬:《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8 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战略大格局——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32 页。

院学者的衡量结果是,1996年综合国力前七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法国、英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对1998年综合国力前七名的排序结果是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清华大学学者对1998年综合国力前五位的排序结果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sup>①</sup>在三种不同衡量结果中,惟一一致的是美国为世界第一。然而,他们对美国实力地位认识的一致性,并非源于客观衡量的结果,而是衡量前对美国实力的主观判断。

目前,学者们还无法就哪种衡量综合国力的方法最为准确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常识来识别哪些衡量方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综合国力衡量方法的合理性不是由其复杂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其衡量结果与人们常识的差别大小决定的。有些衡量方法所得的结果与人们的常识差距非常大,这些方法就是不可取的。例如,有一种方法对2001年17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衡量的结果是:加拿大综合国力位于世界第三,居然大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和中国;澳大利亚的综合国力也大于英国和中国。<sup>②</sup>事实上,不仅在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方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必然小于中国和英国,即使仅从经济实力上进行比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都小于中国和英国。按汇率计算,2001年英国和中国的GDP分别为14292亿美元和11558亿美元,均大于加拿大的10841亿美元和澳大利亚的4185亿美元。<sup>③</sup>

#### (四) 评估分歧引出的问题

根据上述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现象,从中也引出了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一是指标赋值的复杂程度和细化程度对衡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并无影响;二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评估方法,人们都能判断美国的实力远大于其他强国;三是目前人们对中国的实力地位以及未来的增长速度仍无共识。如果复杂的衡量系统和随意的评估都不够准确,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我们评估中国实力

<sup>①</sup>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119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战略大格局》,第18页;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第18页。

<sup>②</sup> 陈沙:《中国:增长与差距》,《世界知识》2002年第7期,第10页。

<sup>③</sup> 《世界知识年鉴2002/200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9和935页;《世界知识年鉴2003/200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75页。

地位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常识能够让我们对美国实力地位达成一致的判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的常识是否足以用来判断中国现有的实力地位? 既然人们对中国实力的现状和未来仍有分歧, 那么我们还要问, 中国现在是否具备了崛起的实力, 今后 10 年中国的实力地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 二、实力地位的相对性及评估意义

笔者认为, 要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实力地位, 就需要明确国际实力地位的性质以及比较实力地位的目的, 否则就会出现综合国力衡量方法越复杂, 但其实用价值越下降的现象, 其研究结果也无助于增加我们对国家实力的认识深度。

### (一) 实力地位是相对的

实力地位是个相对概念, 是指一国实力与外国实力相比较的大小, 并依实力大小进行国际排序。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实力进行比较才能得知。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 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实力地位是高还是低。这意味着, 世界上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 研究国家实力地位或是综合国力才是有意义的。“实力地位”一词包含了“实力排序”和“实力差距”双重含义。实力差距决定实力排序, 但实力排序并不能反映实力差距的性质和程度。冷战时美国和苏联的实力排序分别是第一和第二, 它们的实力差距是超级大国间的程度之别。但冷战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和位居其次的国家(无论是俄罗斯、日本还是中国)的实力排序也是第一和第二之别, 但它们的实力差距则是超级大国与普通大国的性质之别。

一国的实力地位是以该国的国力为基础的, 但却不是由该国国力的绝对量决定的。也就是说, 一国国力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该国实力地位必然随之提高。例如, 19 世纪末, 晚清的中国有了机械工业的经济和装备了热兵器的军队, 其总体实力远大于 18 世纪没有现代工业和只有冷兵器军队的大清帝国初期, 但晚清时期的中国, 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却远远低于清朝初期。1999 年荷兰的 GDP 从 1998 年的 3935 亿美元增长至 3981 亿美元, 其绝对量增加了 46 亿, 但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同期荷兰 GDP 的排序地位却从在韩国之前降至韩国之

后,同期韩国的 GDP 由 3 171 亿美元增长至 4 061 亿美元。<sup>①</sup>

一国实力地位的高低是由该国实力与外国实力的差决定的,但实力差的绝对量并不能说明实力地位差别的程度和性质。两国实力差的绝对量可以表明哪个国家的实力大,从而体现两国实力地位的高低关系。但是,两国实力差的绝对量却不能表达两国实力地位差距的程度和性质。例如,按 2003 年世界银行以汇率标准统计的 GDP,日本与德国的差约为 1.93 万亿美元,德国与巴西的差为 1.97 万亿。<sup>②</sup> 这两个差的绝对值相差无几,但是这并不表明德日两国经济实力的差距与巴德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程度和性质相同。常识即可告诉我们,德日经济实力差距是相同等级上的程度之别,而巴德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是不同等级的区别。

一国的实力地位取决于本国实力与外国实力的比例。仍以 2003 年日本、德国和巴西的 GDP 为例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这一点。2003 年,日本的 GDP 为 4.3 万亿美元,德国约 2.4 万亿美元,巴西为 0.5 万亿美元。<sup>③</sup> 虽然德日 GDP 的差与巴德间的差几乎一样,但日本的 GDP 仅是德国的 1.8 倍,而德国的 GDP 却是巴西的 4.8 倍。这就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的常识认为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地位差别是程度之差,而巴西与德国的经济实力地位差距是等级之别。

简言之,国家实力地位是由两国实力的比例决定的而非它们实力差的绝对量,其表达式为  $S = \frac{A}{B}$  (S 为 A 国相对于 B 国的实力地位;A 为 A 国实力;B 为 B 国实力)。在现实国际政治生活中,当两个国家在具体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它们的实力优势或劣势是由它们之间的实力之比决定的。例如,当边界发生小的军事摩擦时,A 方是 3 个士兵,B 方是 1 个士兵,此时 A 方比 B 方多 2 个士兵,但其实力比 B 方多了两倍,A 方胜算把握是 B 方的 3 倍。如果 A 方士兵为 102 人,B 方为 100 人,A 方仍比 B 方多 2 个士兵,但其实力仅比 B 方多 2%,双方的胜算把握几乎是相等的。因此,在评估中国实力地位以及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 200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 页。

② 世界银行 GDP 统计资料,见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pdf>。

③ 同上。

时,我们也应从中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的比例入手比较,而不是看两国实力差距的绝对量。

### (二) 评估中国实力地位的意义

既然国家实力地位是相对的,那么我们研究中国实力地位的最直接意义就是明确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的实力地位是什么,从而在三个方面加深我们对中国实力地位的理解。

首先,了解实力地位的相对性,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民族复兴”/“崛起”的性质不同于发展。中国领导人于2003年曾提出“和平崛起”,但在2004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又改为“和平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崛起”一词表达的是实力地位的相对性。<sup>①</sup>虽然学者们对“和平崛起”一词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将“崛起”一词理解为是赶超世界强国。<sup>②</sup>对中国人来讲,“民族复兴”和“崛起”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意味着中国要重新获得当年汉唐盛世或康乾时期的世界实力地位,而不是回归到那个时期的综合国力水平。以21世纪初的综合国力水平为标准,中国在汉唐或大清初期的综合国力水平只能相当于目前世界上实力地位非常低的中等国家。由于实力地位是相对的,因此中国的民族复兴只能建立在比别国实力增长得更快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缓慢发展的基础上。低速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的实力地位日益下降,使“民族复兴”/“崛起”无望。

其次,只有了解实力地位的零和性质,才能理解中国崛起所伴随的国际政治权力冲突没有双赢。实力地位与国际政治权力的性质相同,都是零和关系。国际政治权力的总量是无法扩大的,一国实力地位的上升是指一国政治权力的扩大,这必然导致其他某些国家的实力地位和政治权力下降。世界上实力强的国家是少数,实力弱的是多数。截至2002年9月,联合国的成员达191个,但

<sup>①</sup>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6日,第2版;胡锦涛:《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04年4月25日,第1版。

<sup>②</sup> 阎学通等:《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5—20页;阎学通等:《“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51—63页。



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强国或地区强国的国家不超过 10 个。<sup>①</sup> 在中小国家的层次上,国家数量很多。一个小国实力地位上升所获得的相对权力分别来自相同层次实力的众多中小国家,因此每个国家原有权力下降得很少,不易引发权力冲突。如果 100 个小国享有的国际政治权力总量是既定的,每个小国分别享有 1% 的权力。当其中一个小国的实力地位上升使之享有 1.9% 的权力时,其他 99 个小国每国的相对权力仅下降到 0.99%,也就是说原有权力仅减少了 1%。一个大国实力地位上升的结果则不同。大国层次上的国家数量很少,一个大国实力上升所获取的新优势会较大程度削弱少数大国原有的权力。如果世界领导权由一个国家享有,那么该国就享有百分之百的领导权。当另一大国的实力地位上升至与该国相同的水平,两国分享世界领导权,这意味着原先霸主国的世界领导权要减少 50%。由于大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因此只有大国才研究综合国力/实力地位问题。根据实力地位的零和性质,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多数政治冲突将是零和性质的,难以取得双赢结果。

第三,只有明确中国现有的实力地位,才能深入理解冷战后中国与大国的战略关系性质。在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中,美国要防范任何未来有可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或政治集团。中国是冷战后的多强之一,自然成为美国的防范对象之一。然而美国是否将中国作为第一防范对象则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地位。如果中国是多强中实力最强的国家,那么中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首要防范对象。中国与欧洲大国都是地区强国,地理上的分隔使欧洲大国与中国在实力地位上的矛盾很小,因此可以结为战略伙伴共同应对美国的霸权压力。然而,中国与日本都位于东亚,地理位置使中日实力地位的矛盾成为结构性的,冲突难以避免。冷战结束初期,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东亚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当日本在全球和地区的经济地位因他国实力地位上升而下降时,日本就会采取增强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方法来维护其原有的国际地位。如果中国的经济实力地位有取代日本的现实可能,日本就会采取政治上对抗中国的政策。了解中国的现实实力地位,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为何与

<sup>①</sup> 《世界知识年鉴 2002/2003》,第 1120 页。

美、日的战略关系中有结构性矛盾,而与欧洲大国的战略关系中没有结构性矛盾。

图-1 是对 2001—2004 年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进行定量衡量的结果。根据图-1,我们可以看到,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变化曲线有较大相似性,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有性质上的一致性,即实力关系上的结构性矛盾。中日关系自 2003 年起下降速度超过中美关系,其原因是,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对于美国实力地位而言仅是潜在的挑战,对日本的实力地位则已构成现实的挑战,因此日本采取比美国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使得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导致中日关系还不如中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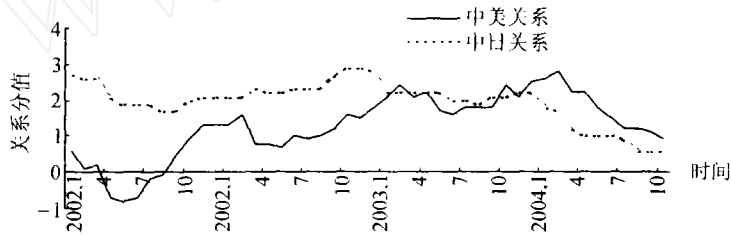


图-1 2001—2004 年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变化

### 三、综合国力及中国实力地位

明确了一国实力地位是相对于他国实力而言的,我们还需要明确实力地位是个综合性概念。虽然“综合国力”一词是冷战后出现的,但国家实力是多要素综合结果的观点自古有之。<sup>①</sup> 不过,人们对综合国力的具体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就是人们对不同国力要素的重要性看法不同。为了客观认识中国综合国力的性质,我们需要明确不同国力要素之间的关系。

#### (一) 国力要素之间的关系

学者们对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有很大的分歧,但对于综合国力的要素分

①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 1—13 页。

为软国力和硬国力两类的看法则有一定的共识。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认为国力有六个要素,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了九个要素,克莱因(Ray S. Cline)总结为五个要素,然而在他们的国力要素中都包括了软硬两类。<sup>①</sup> 冷战后,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也普遍是按软国力和硬国力的概念对国力要素进行分类的。<sup>②</sup>

冷战后,多数研究综合国力衡量的学者都会提到20世纪70年代克莱因发明的国力方程。笔者认为,克莱因贡献的重要性不是他对国力要素的新归纳,而是他的方程明确了软国力与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因数,即综合国力是软硬国力的积而非和这一重要概念。<sup>③</sup> 至今非专业人士仍普遍误以为综合国力是各种实力要素的和。<sup>④</sup> 克莱因方程提出的软国力与硬国力均为综合国力的因数而非加数的概念,使我们意识到软国力与硬国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软国力和硬国力均为综合国力的因数,当一方为零时,另一方无论多大,综合国力都等于零。例如,威慑战略的效力是军事能力与政治决心的积,当军事能力与政治决心中的一项为零时,威慑战略就没有效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也是军事实力与政治决心的积。1991年,当苏联政府没有决心使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时,尽管苏联拥有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也无法阻止国家的解体。在现实生活中,除非国家被灭绝,否则硬实力为零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总有人口、领土和经济基础的存在。但是,软实力为零是时常发生的。当冲突的一方没有信心继续维护其利益时,此时该国在这一具体冲突中的软实力与综合实力均为零。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时,中国政府选择了“为免事件扩大,绝不抵抗”的政策。在维护东北领土这一具体问题上,当时中国相对于日本的软实力和综合实力都为零。<sup>⑤</sup> 其结果是,日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

① 黄硕风:《大较量》,第12—19页。

② 参见第一节中所介绍的中国学者们的研究分歧。

③ 克莱因方程: $P_p = (C + E + M) \cdot (S + W)$ 。其中 $P_p$ 为确认的国力(Perceived Power), $C$ 为基本实体(Critical Mass), $E$ 为经济能力(Economic Capability), $M$ 为军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y), $S$ 为战略意图(Strategic Purpose), $W$ 为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参阅黄硕风:《大较量》,第18页。

④ 耿顺传、李桂云:《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概说》,《中国地理教学参考》2002年第3期,第27页。

⑤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上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页。

东北三省。

实力要素的结构影响综合国力的性质。每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结构是不同的。以 21 世纪初的大国为例,在日本和德国的综合国力构成中,经济实力的比重远远大于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在俄罗斯的综合实力构成中,军事实力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经济实力;相比之下,美、中、法、英四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就较为平衡,其中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比重差别不是特别悬殊。有人认为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中是决定性的,其实这种观念恰恰不符合综合国力的内涵。<sup>①</sup> 国家在处理具体的国际事务时不是靠抽象的综合国力,而是运用具体的实力要素,也就是说国家在应对安全威胁时主要依赖军事实力,应对经济摩擦时主要仰仗经济实力,应对政治压力时主要依赖政治实力。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并不是随时可以转换的,任何一种实力转换成另一种实力都需要严格的条件和较长的时间。实力要素转换的困难决定了国力结构平衡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实力优势,也就是说,在维护不同类型国家利益时都有相应的手段。如果说国家需要维护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均等的,那么实力结构平衡的国家就能在多数事务上获得优势,也就是综合国力的优势;而实力结构不平衡的国家就只能在某类利益上获得优势,而没有综合国力的优势。将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和日本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一点。1985 年苏联的 GDP 为 7419 亿美元,日本为 12200 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 39885 亿美元的 18.6% 和 30.6%。<sup>②</sup> 虽然苏联的经济总量比日本要小得多,苏美经济实力的比当然也远小于日美,但苏联有与美国相似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因此苏联的综合国力是超级大国,与美国属同一等级,而日本因其实力结构中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比重太小,其综合国力只能是普通大国,而非超级大国。

### (二) 中国综合国力的性质与地位

依据国际地位的综合内涵,我们可以采取等级分类法来分析中国的实力地位。笔者以为,研究中国实力地位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别性质,而不是要精确衡量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实力差别程度。因此,采取等

<sup>①</sup>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 12 页。

<sup>②</sup> 《世界知识年鉴 198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86 和 392 页。

级分类法就能判断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别的性质,而无需复杂的指数衡量系统。至今,笔者所见到的综合国力衡量方法都摆脱不了主观赋值的做法。由于国力要素的赋值是主观的,因此这些定量衡量方法的复杂性未能提高衡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既然衡量综合国力的核心目的是判断大国实力差距的性质,那么综合国力衡量方法的本质应是建立一种国力衡量的标度,而不是解析国力的成分。这如同温度计的功能是区别温度的差别而不是解析温度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要一种方法能有效判断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性质,这种方法就基本上满足了综合国力衡量的需要。事实上,当两国的实力差距明显时,人们无需任何特殊的衡量方法,依据常识就能判断它们的国力大小。例如,人们根据常识就能判断目前美国的综合国力比中国大,中国的比澳大利亚大,澳大利亚的比新西兰大,新西兰的比文莱大。

在本文中,笔者采取了一种较为简便的衡量方法,即依据国际关系常识判断中国的实力等级,再以实力结构特点判断中国实力在同一等级国家中的地位。美国是冷战后的惟一超级大国,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通常识,这一常识实际上也影响着较为复杂的综合国力衡量方法的赋值评估结果,即美国的综合国力远高于其他大国。依据这一常识,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的实力还没有达到超级大国等级。依据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格局的常识,我们已知中国是多强之一,因此中国的实力地位与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属于同一等级。在明确了中国的实力地位等级之后,我们可依据实力结构来判断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其他几强的差别。为此,我们需要将这几个普通大国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按强弱分为两档。

在军事实力上,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PPP)两种统计结果的平均值计算,2002年中国、日本、印度、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这七国的国防开支次序分别为中国、日本、印度、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虽然中国在七国中军费开支最高,但这七国国防开支的两种统计结果都是在百亿美元的等级,没有达到千亿美元等级的(当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为3357亿美元),仍属于同一等级(见表-1)。

表-1 2002 年美、中、日、印、法、英、俄、德的国防开支 单位:亿美元

	美国	中国	日本	印度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德国
按汇率计算	3 357	311	467	129	336	360	114	277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3 357	1 429	328	665	368	340	554	310
平均值	3 357	870	397.5	397	352	350	334	293.5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年鉴 2003: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1 页。

一国在既定时间的军事力量是前期军事建设的积累结果,而不是当年国防开支的结果。因此,应将战略核力量与国防开支两者综合考虑来判断上述七国的军事实力的强弱级别。根据同一数据来源,2003 年各国核弹头的数量分别是:俄罗斯 8 332 枚,中国 402 枚,法国 348 枚,英国 185 枚,印度 30—40 枚,日本和德国为零。<sup>1</sup> 俄罗斯国防开支虽然少于其他核国家,但其核武器数量等级仍高于其他核国家。军事实力的第三项指标是军队规模,军队规模表明常规军事装备的数量和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的人员的多少。中、俄、印三国军队规模都在百万人以上,法国为 44 万,英、德、日军队规模在 20—30 万人之间。<sup>2</sup> 将国防开支、核力量和军队规模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考虑,按强弱两个等级划分,七个普通大国的军事实力等级是俄、中、法、印、英为强,日、德为弱。

政治实力上,中、俄、法、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德、印不是,因此前四国为强,后三国为弱。

经济实力上,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 年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统计结果的平均值计算:七个普通大国的 GDP 在 2 万亿美元以上的是日、中、德,其等级可视为强;2 万亿以下的是印、英、法、俄,其等级可视为弱。(见表-2)

表-2 2003 年中、日、德、法、英、俄的 GDP 单位:万亿美元

	日	中	德	印	英	法	俄
按汇率计算	4.32	1.40	2.40	0.60	1.79	1.75	0.43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3.58	6.43	2.28	3.10	1.60	1.63	1.31
平均值	3.95	3.92	2.34	1.85	1.70	1.69	0.8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GDP 统计资料。见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pdf>;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_PPP.pdf](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_PPP.pdf)。

<sup>1</sup>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年鉴 2003: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15 页。

<sup>2</sup> 《世界知识年鉴 2003/200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163、257、614、643 和 789 页。

依据上述对七个普通大国不同实力的强弱档次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下表。

表-3 21世纪初的中、法、英、俄、日、德、印的国力结构

	中	法	英	俄	日	德	印
军事实力	强	强	强	强	弱	弱	强
政治实力	强	强	强	强	弱	弱	弱
经济实力	强	弱	弱	弱	强	强	弱

在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三种实力上都属于强档的国家只有中国,这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实力结构相对平衡的国家;两项处于强档的国家是法、英、俄三国;而日、德、印三国都只有一项为强档,实力结构明显不平衡。在前面有关实力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已经阐述了为何平衡的实力结构才具有综合国力优势的原因。由于中国与其他六国的实力处于同一等级,而中国的实力结构比其他六国更为平衡,结构上的优势决定了中国的综合实力要大于其他六个国家。

依据软国力与硬国力同等重要的原理,我们可以判断中国实力的特点以及与美国实力的差别。中国的综合实力不仅总体上小于美国而且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单项实力上都小于美国。然而,如果进行单项比较,中国在这三项实力与美国的差距并不相同。军事上,2002年中国核弹头数量仅为美国7600枚的5.3%,2003年的国防开支按汇率和按购买力平价平均值计算是美国的26%。<sup>①</sup>经济上,2003年中国的GDP按汇率计算是美国10.9万亿美元1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59%,按两者的平均值为36%。<sup>②</sup>政治实力是指一国的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sup>③</sup>从国内动员能力来讲,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区别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国内动员能力强于美国,因为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拥有更多的行政手段动员国内力量。在国际上,中国的政治动员能力则小于美国,但这个差距小于中美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例如,1990—2001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10次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反华

①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2》(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9和371页。

② 世界银行统计资料,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pdf>;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_PPP.pdf](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_PPP.pdf)。

③ “政治动员能力”是指可使用的政治资源,不同于政治动员能力的法律基础或社会基础。

议案,但每次都被中国挫败。<sup>①</sup>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动员国际力量捍卫自己政治利益的能力,明显大于中国在国际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能力。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未能在任何一件与美国发生冲突的经济或安全事务上表现出如此强大的抵抗力量。根据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最突出的方面是军事实力,其次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方面的差距最小。

### 四、实力地位变化与中国崛起速度

进入 21 世纪后,有关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级强国的预测越来越多。有人认为中国再有 10 年就能与美国一样强大,有人则认为需要 20 年,还有的认为要到 2040 年才能行。<sup>②</sup> 虽然各种预测分歧很大,但是这些预测都是以近年来中国实力总量增长速度为依据的,这些预测基本上不考虑其他国家实力增长会对中国实力地位变化有何影响。我们已知,中国的实力地位是相对其他国家的实力而言的,因此预测中国未来实力地位的变化是不能只考虑中国的实力增长速度的,还得考虑其他国家的实力变化情况。为了解未来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趋势,我们需要明确实力地位上升与下降的条件是什么。

#### (一) 实力地位升降的条件

鉴于国家的实力地位是由国家间的实力总量对比决定的,因此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将取决于两个国家实力在既定时间内增长速度的差。依据前面国家实力地位的表达式,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表达式应为  $S_c = \frac{A(1+Ra)}{B(1+Rb)} - \frac{A}{B}$  ( $S_c$  为 A、B 两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结果, A 和 B 分别为 A、B 两国原有的实力, Ra 和 Rb 分别为 A、B 两国的实力增长速度)。从这个表达式可以看到,国家实力地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 2002 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8 页。

<sup>②</sup> 《决定性的考验》,《解放报》(法国)2004 年 12 月 9 日,转引自《中国崛起打乱了世界排序》,《参考消息》2004 年 12 月 11 日;杰里米·布朗斯滕:《中亚:中国影响力日增》,美国欧亚新闻网 2004 年 11 月 24 日;马库斯·吉:《中国在崛起,做好准备迎接中国世纪》,《环球邮报》(加拿大),转引自《环球时报》2005 年 1 月 5 日,第 9 版。



位的变化完全取决于所比较的两个国家在既定时期内的实力增长速度( $R_a$ 和 $R_b$ ),也就是哪国的实力增长速度大,哪国的地位就上升,反之则下降,速度相等则两国实力地位关系不变。在既定时期内,对一国来讲,两国实力增长速度所产生的结果有上升、下降、不变三个,但导致这三个结果的情况却有十种,除去实力地位不变的三种情况外,实力地位上升与下降均各有五种情况。<sup>①</sup>

一国能在几十年内崛起是个政治问题,一国几百年后崛起则是个历史问题。由于一国实力萎缩是加大他国实力地位上升速度的重要条件,也是促使双方实力地位交换位置的主要情况,因此国力萎缩比国力增长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政治问题。由于一国的实力在多数年份里是正增长,只在少数年份里是负增长,而只有极个别年份才出现零增长,因此十种实力地位变化情况的发生概率不同。两国实力总量同时正增长是最经常发生的,其次是一国正增长、另一国负增长,再次是两国同时负增长,最少发生的是一国零增长、另一国正增长或负增长。如果两国实力同时正增长或负增长,两国实力差距的变化和实力地位的转换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力地位换位的概率较小。如果一国实力总量是零增长,两国实力差距的变化将较快,实力地位转换位置的概率也较大。然而,两国实力差距变化最快和实力地位转换概率最高的情况是两国实力逆向发展,即一国正增长、另一国负增长( $R_a > 0 > R_b$ 或 $R_a < 0 < R_b$ )。由于两国实力逆向发展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而且国家实力增长又是经常性的普遍现象,因此导致国家实力萎缩的因素比增强国家实力的因素在改变国家实力差距和实力地位的速度上的作用更重要。

政治灾难能使一国的综合实力迅速严重萎缩,改变国家实力地位的速度要大于经济发展。战争失败、国家解体、爆发内战、社会动乱、政治运动等都能较快地转换两国的实力地位。冷战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苏两国实力地位的转换。在1991年解体之前,苏联是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中苏在实力上的差别是等级之别。俄罗斯继承了解体后的苏联,其综合国力顿时下降,领土减少24%,人口减少48%,经济总量减少了11%,军队规模缩小33.7%。<sup>②</sup>虽然此

<sup>①</sup>  $Sc > 0$ 的五种情况: $R_a > R_b > 0, 0 > R_a > R_b, R_a = 0 > R_b, R_a > 0 = R_b, R_a > 0 > R_b$ ;  $Sc < 0$ 的五种情况: $R_b > R_a > 0, 0 > R_b > R_a, R_a = 0 < R_b, R_a < 0 = R_b, R_a < 0 < R_b$ 。

<sup>②</sup> 《世界知识年鉴1992/199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76—580页。

时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仍大于中国,但中俄实力差别已非等级之别,而是同一等级的强国的程度之差。而后,俄罗斯经济连年负增长,军事力量严重萎缩,国际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虽然难以断定中俄综合实力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哪一年转换的位置,但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综合实力地位是在此期间超过了俄罗斯,因为到1999年俄罗斯仅能保持军事实力上强于中国,在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上都远远小于中国了。1999年,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1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sup>①</sup>

经济危机可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迅速缩小,能比经济发展更快地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差距和实力地位。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迅速拉大,同时使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这场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由危机前的9%以上降至7%左右,但却使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或零增长。<sup>②</sup> 印尼的GDP由1995年的1903亿美元下降至1998年的500亿美元(汇率由1996年的1美元=2321印尼盾降至1998年1美元=7500印尼盾),2003年才恢复到2083亿美元,比1995年仅多9.5%。<sup>③</sup> 同期日本的GDP由1995年的50831亿美元缩小至2003年的43264亿美元,减少了15%。<sup>④</sup> 同期,中国的GDP(按汇率计算)由1995年的7041亿美元增长至2003年的14099亿,增长了1倍。<sup>⑤</sup> 8年里,印尼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差距由3.7倍扩大至6.8倍,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则由7.2倍缩小至3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还超过了日本,使双方的经济实力地位发生了转换(参见表-2)。

### (二) 中国实力地位的升降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

依据国家实力增减逆向变化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关系的原理,我

① 《世界知识年鉴2000/200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7和641页。

② 《中国统计摘要200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③ 《世界知识年鉴1997/199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世界知识年鉴1999/200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见世界银行网站统计资料,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pdf>。

④ 《世界知识年鉴1996/199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见世界银行网站统计资料,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pdf>。

⑤ 《世界知识年鉴1996/1997》,第32页。

们可以得知,今后 10 年(到 2015 年)中国能否保住现有的实力地位,主要取决于中国是否发生导致实力下降的政治危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四升三降。1950—1958 年是中国实力地位上升时期。这期间朝鲜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地位和中国在国内外的政治动员能力,1952—1958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1.9 倍。<sup>①</sup> 1959—1963 年是中国实力严重萎缩时期。1957 的反右运动促使中国政府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导致经济全面衰退,1964 年经济规模才恢复到 1960 年的水平<sup>②</sup>;1959 年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美苏的共同遏制。1964—1965 年出现一个短暂的实力提升后,1966—1976 年中国实力地位再次下降。1966 年 5 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混乱,政府维持国家正常秩序的能力大减,生产停滞、军力下降。而同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相对于中国的实力地位迅速上升。1978—1988 年中国恢复了国家秩序,提高了政府的国内动员能力,与美苏关系的正常化提高了中国的国际政治能力,经济保持了年均 10.2% 的高增长率。<sup>③</sup> 1989—1993 年“北京政治风波”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速度下降,但更重要的是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而政治实力的急剧萎缩使中国的实力地位也下降了。1993—2004 年是中国实力地位上升时期。这期间中国摆脱了 1989 年后的国际孤立状态,国内外的政治动员能力不断增大,1993—2003 保持了年均 9.2% 的 GDP 增长率,特别是 1997 年的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实力地位的上升速度。<sup>④</sup>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每次实力地位严重下降都源于政治危机,而非战争或经济因素。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今后中国只要不再发生政治危机,基本上就可以避免实力地位下降的危险。

依据国家实力在多数年份是正增长的原理,笔者认为今后 10 年内影响中国实力地位上升速度的主要外部因素将是美国军事投入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增减程度,以及欧盟一体化的速度。根据目前世界主要大国综合实力增长趋势,笔者认为,今后 10 年除美国之外,任何单一国家的综合国力都难以超过中国。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 <http://210.72.32.26/yearbook2001/2002/c0301c.htm>。

② 同上。

③ 《中国统计摘要 2003》,第 22 页。

④ 同上。

单独一个欧洲国家的实力已小于中国,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单位,其实力则大于中国。目前欧盟的国家化发展趋势有可能使欧盟在 10 年后成为具有国家性质的国际行为体。因此,今后 10 年判断中国实力地位的参照标准将不仅是美国,还得考虑欧盟。有人认为中国未来实力地位基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显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欧盟在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变化这两个因素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影响。<sup>1</sup> 由于中国拥有巨大的低工资劳动资源,因此今后 10 年中国经济实力增长速度会大于美国与欧盟,在经济实力方面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差距能缩小。但是,今后 10 年中国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相对于美国和欧盟来说,其变化速度则是不确定的。

今后 10 年,中国与欧盟的军事实力差距有可能缩小,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变化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对“台独”进行武力遏制。由于“台独”分子制定了 2008 年法理“独立”的时间表,因此中国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加快提高军事力量以遏制“台独”。而欧洲较好的安全环境不会促使欧盟加大军事投入。因此今后 10 年中国军事投入的增长速度会大于欧盟,与欧盟的军事实力差距也必然缩小。然而,今后 10 年中美之间军事实力差距能否缩小,则取决于双方在军事投入上的增长速度。如果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台独”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就有可能缩小。但如果美国不断对一些国家发动战争,而中国无需对“台独”进行军事打击,那么美国军事投入的增长速度就会大于中国,中美两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则会进一步拉大。

今后 10 年,中国有可能缩小与美国的政治实力差距,但与此同时中国相对于欧盟的政治实力优势也可能缩小。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范围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曾使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达到其历史顶峰。美国在发动 1991 年海湾战争、1996 年索马里战争、1999 年科索沃战争以及 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时,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许多国家还为美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支持。然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从 2003 年起严重下降。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遭到了法、德为首的一些欧洲传统盟国的

<sup>1</sup> 李斌:《2020 年中国综合实力跻身世界三强》,《瞭望新闻周刊》2004 年 9 月 27 日,第 18 页。

反对。<sup>①</sup> 由于在伊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今后 10 年,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将继续执行单边主义为主的对外政策,而中国则会坚持多边主义对外政策,发展与周边国家、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会缩小中美在政治实力上的差距。目前,中国的政治实力大于欧盟,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单一的国家行为体,而欧盟还是一个地区组织,其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不能完全一致。1999 年欧盟启动了欧元,2002 年欧元开始流通,实现了统一货币。<sup>②</sup> 2004 年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了欧洲宪法,要为欧盟国家化建立法律基础。<sup>③</sup> 今后 10 年内,如果欧盟成员国批准了这一宪法,欧盟将建立理事会、委员会和外交部三位一体的行政机构,这将加强欧盟的国家行为体性质,从而可能会缩小欧盟与中国在政治实力上的差距。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将美国和欧盟都作为单一的国家行为体进行比较,到 2015 年,中国与美国、欧盟的综合实力差距都能缩小,但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地位可能位居第三。今后 10 年,中国可能缩小与美国、欧盟的经济实力差距,但总量仍然小于它们;中国军事实力有可能缩小与欧盟的差距,但总量还是小于欧盟和美国;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实力上的差距能较快缩小,但难以达到相同水平;中国仍可保持比欧盟强大的政治实力优势,但差距可能会缩小,因为欧盟成员国 10 年内有可能完成欧盟宪法的国内批准程序。

本文第三部分已经讨论了目前中国为多强之首的实力地位,依据增长速度大的国家实力地位相对提高的原理,我们可以认为,今后 10 年中国与日、俄、印三国的实力差距将扩大。鉴于 2015 年后欧盟有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英、法、德不再作为单一的国际行为体,因此这里只评估中国与日、俄、印三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变化。

经济实力方面,低价的劳动力和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决定今后 10 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将必然快于日本和俄罗斯。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 年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26 940 美元、

① 蔡方柏:《欧美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17—19 页。

② 《世界知识年鉴 2002/2003》,第 1195 页。

③ 史克栋:《“大欧洲”迈出一大步》,《人民日报》2004 年 10 月 30 日,第 3 版。

8 230 美元和 4 580 美元。<sup>1</sup> 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不到日本的 18%、俄罗斯的 56%。低廉的劳动力将保证在中国的投资有长期的高利润回报。2006 年起,中国将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定实行浮动汇率,人民币的升值将改变对中国 GDP 的汇率统计标准,这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显得更快。印度虽有与中国相似的低价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优势,但印度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速度都小于中国,因此今后 10 年其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将继续低于中国。

军事实力方面,今后 10 年日、俄、印三国都不会面临与超级大国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因此,它们的军事投入增长速度将小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虽然也面临克什米尔和车臣的分离主义威胁,但美国不会对这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提供直接的军事保护。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对俄、印形成的安全威胁远小于中国面临的“台独”问题。日本有美国的军事保护,因此军事投入的增加速度也不会大于中国。日本政府决定 2005—2009 年的军费开支将降到 2330 亿美元,比以往 5 年年均额减少 3.7%。<sup>2</sup> 由于中国面临着因“台独”问题与美国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因此今后 10 年中国的军事投入增长速度将大于日、俄、印,这将缩小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差距,同时拉大与日、印的军事实力差距。

政治实力方面,今后 10 年,中国推动的东亚区域化政策将能有效地提高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号召力,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改善将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印度、俄罗斯和日本都难有机会提高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印度已是南亚的主导国,但南亚区域化的整体力量和发展潜力都小于东亚。欧盟东扩还在挤压俄罗斯在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影响力。日本为了保住日美同盟特殊关系,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采取了类似英国对欧盟的政策,这种与东亚若即若离的策略将削弱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在全球事务上,印度和日本虽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难以获得否决权,只不过是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固定化,并没有实质性地扩大权力。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上的政治影响力将因苏联解体后的衰退惯性而进一步萎缩。

<sup>1</su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9—140 页。

<sup>2</sup> 《日本新的军事重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纽约时报》(美国)2004 年 12 月 11 日。转引自《日本军事矛头直指中朝》,《参考消息》2004 年 12 月 14 日,第 1 版。

## 五、结 论

以国家为比较单位,中国的综合实力地位排序已是世界第二,但与美国的实力地位相比还不是相同等级。有关中国的综合国力是否位居世界第二已经争论多年,大家对国家实力的认识分歧严重影响了共识的形成。无论是出于什么政治动机,强调国家实力地位综合性的人,都会认为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对综合国力的作用都大于或至少不亚于经济实力,他们所评估的中国实力地位基本上是世界第二;而强调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基础的学者,普遍是以经济实力特别是汇率计算的 GDP 为主要指标,因此他们评估的中国实力地位基本上是世界第六,也就是与汇率计算的 GDP 排序一致。冷战后强调经济实力重于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人,难以接受中国在与美国有巨大经济实力差距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的判断。

“实力地位”包含了“实力差距”与“实力排序”双重含义。实力差距不大的两国,其实力地位可以排为第一和第二,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实力差距大的两国之间如果没有第三国可以插入其间,这两国的实力地位排序也是第一和第二,如 21 世纪初的美国和中国。目前美中实力差距与当年美苏实力差距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等级上的差别,即超级大国与普通大国的差别,后者则是同等级内的差别,即两个超级大国实力程度上的差别。

防止中国实力地位下降的关键因素是避免重大政治决策失误。通过对国家相对实力地位变化条件的归纳,我们发现一国综合实力萎缩是改变两国实力差距或实力地位的最有效条件。国家综合国力在大多数年份是增长的,只有少数年份是萎缩的,但是综合国力每年的增长是缓慢的,而萎缩则可能是迅速的。因此,国家实力地位的转变与其说是综合国力增长的竞争,不如说是综合国力不萎缩的竞争,也就是说,不是比谁的国力总量增长得快而是比谁的国力总量不出现萎缩。1991 年苏联的解体和 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俄罗斯和中国的综合实力严重下降。这两次历史经验表明,重大负面政治事件是综合国力萎缩的主要因素。发生政治灾难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决策失误。20 世纪 8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苏联解体;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的反右

运动导致了“大跃进”之后的灾难;60年代的反对修正主义带来“文化大革命”灾难。反之,正确的政治决策则可以较快地提升国家的实力地位,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都使中国实力地位得到较快上升。既然重大政治决策对实力地位的升降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实力地位的竞赛也就成为一场不犯或少犯重大政治决策错误的竞赛。有鉴于此,中国要保住现有的国际实力地位,其关键是政治决策不出现重大失误。依据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只要不进行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能有效地限制重大政治决策失误对综合国力的破坏程度,从而避免国力严重萎缩和实力地位下降。

中国的实力地位在2015年有可能达到准超级大国水平,按国家排序中国仍为世界第二,但若欧盟成为统一的国家行为体,中国实力地位排序则降至世界第三。今后10年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国内和国外两种政治因素。国内因素为是否发生重大政治决策失误,国外因素是美国的政治实力变化和欧盟政治一体化的速度。今后10年,美国军事上的超强实力地位将会促使美国继续实行单边主义政策。在中国和欧盟采取多边主义政策的条件下,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将削弱其国际动员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则会提高。同期中国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将会超过美国。中国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将有效地缩小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将扩大与日本、俄罗斯、印度的综合实力优势,因此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可能位于美国与普通大国之间的准超级大国水平。中国的实力地位等级上了一个台阶,但排序则有可能后移。到2015年,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很可能使欧盟成为具有单一国家性质的国际行为体,成为另一个准超级大国,这样中国的实力地位排序将由目前的第二降为第三。

对中国未来实力地位的评估可以作为我国制定长期战略目标的依据,但不宜成为判断长期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的依据。自2002年以来,有关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战略机遇期的讨论已经很多。笔者以为,能够准确预测20年国际环境发展趋势的概率是极低的。对今后20年中国实力地位的评估只是说中国有可能达到的国际地位,而并不能说明这20年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会发生什么变化。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sup>①</sup> 在制定这个目标时,无人预知 1989 年的政治风波、1991 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及这些事件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影响。如今,我们若以所预测的 2020 年中国可能达到的实力地位作为预测未来 15 年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依据,就可能低估“台独”问题在 2015 年以前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从而影响国防建设的必要速度。

根据本文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实力地位已经开始进入逐渐发生质变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正从一个在国际政治天平上起砝码作用的国家向起天平托盘作用的国家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中国需要对其对外策略做相应的调整。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应从选择加入哪个托盘向争取更多砝码加入自己这个托盘转变。中国实力地位已经使中国的任何战略立场转变都会严重影响国际政治的稳定,无论中国与美国变成军事盟友或是全面对抗的敌手,都会使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动荡。而若中国以东亚为中心,加大东亚区域化战略的力度,就能促使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转化。东亚区域化如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非常不愿接受中国崛起前景的日本也将不得不改变其对华强硬的政策,会效仿英国一定程度地参与地区一体化的进程,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态度。中国实力地位在 21 世纪初的变化,意味着中国需要采取主动有所作为的策略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迅速扩展的国家利益,从而使中国此次崛起的过程是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年。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 页。

## 作者简介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1992年)。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1年),译著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2003年)。

电子信箱:yanxt@mail.tsinghua.edu.cn

**江忆恩**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1993年)。研究兴趣为国际制度、身份认同和战略文化。著有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1995)。

电子信箱:johnston@fas.harvard.edu

**朱毓朝**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皇后大学政治学博士(1996年)。曾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中国研究》(日本)、《二十一世纪》、《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以及 *Issues and Studies*,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Pacific Review*, *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电子信箱:yuchao.zhu@uregina.ca

**郭钢**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2002年)。1997年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2001年获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东亚政治、比较政党和政治统计分析。

电子信箱:gg@olemiss.edu

**周宝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2003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毕业。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电子信箱:zbq04@mails.tsinghua.edu.cn

**秦亚青** 外交学院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博士(1994年)。著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8年),译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年)、《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2003年)等。

电子信箱:yqqin@cfau.edu.cn